皓首学术随笔

戴逸卷

戴　逸　著

中华书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小传

戴逸，1926年生，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1944年常熟中学毕业。1946年上海交通大学肄业，转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通缉，1948年前往解放区。入正定华北大学一部学习，后留校在政治研究室工作。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任中国革命史实习教员，1953年任中国历史教研室讲师，专攻中国近代史。1956年任副教授。196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文革期间被批判审查，下放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成立清史研究所，任副所长、教授，1980年任所长。1982年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士生导师。1988年任中国史学会会长，1989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1992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1996年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稿》、《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等。

现主持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清史》的编纂项目。

传统和现代化

我们当前肩负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有什么关系？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抱什么态度？这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文化传统，一般说来，是特定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它或者表现于物质载体，如建筑、雕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或者表现于语言文字；或者表现于抽象的性格、能力、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标准；或者表现于各种知识信息的积累、贮存。文化传统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地形成的。人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文明成果，明天就会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层层堆积的传统遗存。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生活、成长，既不能脱离传统，也不能自由地选择传统。每个人都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哺育下生长，都在这一传统中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形成思维和工作方式。传统和我们的关系与生俱来，十分密切，渗透在我们的每根血管中。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伟大传统的儿女，对它当然有深切的眷恋之情。

但人类历史是不断前进发展的。传统只反映过去，一旦成为传统，它就凝固起来，成为历史的文化积存。它既保留、体现民族的优良特征，同时又偏离开日益发展的新生活，有时会和新生活发生严重的冲突。所以，传统是巨大的惰性。不管传统文化多么悠久、多么丰富、多么光辉灿烂，有时，它反而成为民族进步的沉重负担。传统，是旧生活的反照，不是新时代放射的光芒。

传统和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环节，相互衔接又相互矛盾。传统是昨天的创造活动的积淀，是已经完成了的过去式，是历史活动的终点。

而现代化是当前行动的目标，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是新生活的起点。现实生活，必然要冲击、改变旧传统，为自己的胜利前进开辟道路。担负着现代化责任的人，对传统必然是有所继承、有所改造、有所革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态度恰当地说明了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对于我们的悠久文化传统应当珍惜重视，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体制、宗法式的社会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长的基础，它反过来又为之服务，成为相对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持。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文化中精彩的要素、闪光的颗粒，又要看到它和现代化迥然不同的性质、结构和功能。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个孤立的、基本上隔离的环境中生长、发展，在近代以前，虽然也有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并未改变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和排他性，适应变化的能力较差。

近代的资本主义入侵，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传入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产生了新的阶级和人际关系，输入了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对立、冲突。许多人作过中西文化的对比，评论其优劣得失。其实，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各有其成就和局限，各有其存在的自身价值，本无所谓孰优孰劣。只是相对于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落后于生活，不能成为救亡图存、复兴中国的精神力量。近百年来，我国的先进分子，探索救国之路，向西方学习，即是用西方的近代文化来代替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西方的近代文化是一个整体，既包含船炮机械、科学技术，也包含民主、法制、人权，包含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整套的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等。其实，马克思主义正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最高结晶。中国人民历经艰难曲折才找到了这一正确的科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取代西方的近代文明，这是历史已作出的结论。任何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

命的精神堡垒，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动力的企图都是注定要落空的。因此，鼓吹回归到东方文明或儒学的第三次复兴都是不可取的。应当说明：吸收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借鉴是一回事，而全面地回归和复兴传统文化是另一回事。为了创造新生活，最好是无情地和过去告别。在这里，脉脉的温情、美好的追忆、发思古之幽情都是无济于事的。《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说过："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所谓"告别"和"决裂"当然不是一笔抹煞、简单抛弃，而是指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整个体系上，在其结构、功能、价值观念上应迥异于传统文化，超越传统文化。文化建设不是靠口号、声讨、"大批判"所能解决的。重要的是切切实实地工作。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点滴积累，从发展经济、普及教育、提高文化做起。"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记忆犹新，它以文化的"革命"、"破四旧"的响亮口号开始，最终走向反面，成为文化的破坏和旧传统的复辟，而且，复辟了旧传统中最阴暗、最消极的方面：专制主义、个人迷信、封建特权、文字狱、自大狂、闭关锁国、践踏知识与人权。"现代化"需要建立人和人的新关系，需要发展民主、科学、法制、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现代化所需要的，正是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

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封建主义的残余，它是阻碍改革和进步的巨大阻力。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切不能忘记这个无情的现实。在肯定传统文化中精华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其中的糟粕，我们才不会感情用事，才不会丧失鉴别的能力，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文史知识》1987 年第 1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谈学术自由

这次作家协会开会，党中央鼓励文艺界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历史学界也应当鼓励研究自由。自由地选题，自由地发表学术意见，自由地讨论和批评，这是发展历史科学的必需。

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能把自由当做随心所欲。人们的行动要按规律办事，总要受主客观的制约。自由和必然，自由和法制，自由和纪律是矛盾的统一，世界上不存在那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的自由。自由和人类的实践相联系，人类越是进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越强，自由也就越多。自由和马克思主义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在马克思主义下才有最大的自由，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更多的自由，并且只有在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自由的土壤，否则，它便会僵化、变质、死亡。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那是通过理论的威力，通过讲理和说服，因为真理最有力量，真理迟早会令人信服，而不是以势压人，不是下达行政命令，那就不叫指导，而叫压服，或压而不服。我们不能像汉武帝那样罢黜百家，定于一尊，不能用政治运动、大批判的办法来对待学术问题，那是错误的、极“左”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十年动乱时期登峰造极，结果是万马齐喑，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而马列主义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种声音，就是“四人帮”的帮腔，严重地摧残了科学。这种做法当然并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是歪曲、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千万要以此为戒。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社会经历了思想解放过程，从“四人帮”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取得了民主和自由。今天，学术自由比三十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充分些，因此出现了学术的繁荣气

象。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了较大的学术自由。

今后,历史科学的发展要继续提倡和发扬学术自由,贯彻双百方针,允许各种意见都摆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造成自由的学术气氛。我们可以不同意某种学术意见,但应尊重对方,虚心倾听不同意见,允许讨论和申辩,不能粗暴地打击。有的同志习惯于一种意见,碰到新的意见,新的想法,视为离经叛道,洪水猛兽。其实,学术界总有各种学派存在,各种意见存在,不可能"舆论一律"。学术上的"舆论一律",定于一尊没有什么好处,也根本办不到,因为世界之大,事物之复杂,变迁之迅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全都一致。由于观察的角度、重点、方法不同,掌握资料的不同,认识深入程度的不同,因此产生各种不同的看法,人们总要有个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逐渐接近真理。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并没有什么可怕,马克思主义决不会因此垮台,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才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引导主观的认识更接近于反映客观的实际。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很多不同意见的比较和辩论中,吸收合理的因素而丰富、充实起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偏狭的学派,而是集中全人类的智慧形成的。例如:有人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或计量数学等研究社会历史,这不失为有意义的探索,尽管目前尚不完善,尚有缺点,应该鼓励这种探索,而不应排斥、打击。

我们面临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学术界要能适应这种新形势。随着对外开放,各种思潮、观点,正确的和错误的,都会在国内传播,凡是学术上的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只要不是在政治上捣乱,不触犯法律,都可以存在,实行最充分的学术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用不着害怕研究各种各样的主义,如果有合理的部分可以借鉴、吸收,如果有错误的东西,也可以知道它错在哪里。对当代世界上的社会科学成就不闻不问,拒"敌"于国门之外,自我封锁,结果反而使我们的学术界闭目塞聪,孤陋寡闻。

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这是马列主义的新创造,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解决了香港问题,今后也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和世界上的其他

问题。一个国家内,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可以较长期的并存,也必定要允许两种或更多种的思想较长期的并存,因为思想是上层建筑,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我们要学会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正确对待不同的学术意见,实行最大程度的学术自由。譬如今后和香港、台湾的学术界交往,或者和外国学者交往,就不能要求人家都是唯物史观,都信奉马列主义,在学术上也可以求同存异,要有学术上的雅量,不能戴上"左"的有色眼镜,挑错找岔,唯我是从,对人家开展大批判,无限上纲,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这种粗暴态度就谈不到和港台学者的交往,也谈不到开展正常的国际学术文化的交流。

我相信,今后历史学界对"百家争鸣"的方针将会贯彻得更好,将鼓励更多的学术自由,而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1987 年)

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和环境

清代边疆开发史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清代268年间，倾注很大力量于边疆的经营与开发，中国的版图得以奠定，民族的团结大大增强，国家的统一更加巩固，边陲地区的经济文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农业生产、耕地垦辟、水利灌溉、道路交通、商业贸易以至晚清时期的荒地放垦、修筑铁路、设置厂矿、建立行省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清代对边疆开发的规模和深度，远远超过汉唐盛世。

所谓“开发”，即人对环境的利用、改造。边疆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自然环境指地形、气候、雨量、土质、动植物、矿藏等等，人利用这些资源谋求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的或丰或啬，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开发的速度。政治环境指当地的政局和秩序，战争还是和平？统一还是割据？和中原地区的联系是密切还是松散？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谈得到开发。中国是个大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辽阔广大的边疆与海疆，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滇桂以及台湾、海南，或为内陆，或为海岛，或属战乱，或属安定，情况千差万别。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活动方式，既有其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认识和揭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人是开发活动中的主要因素。人改造、开发环境，使其成为可享用的富源。边疆地区，地广人稀，为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经济效益，必须有足够数量并具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劳动力，必须保证人口达到充足的数量和相当的素质。因此，边疆开发的前提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清代统一国家的巩固，形成了适宜的移民条件。清中叶后，中原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出现相对人口过剩、人均耕地锐减，生计维艰，形成人口“压力”，而边疆地区

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优裕的谋生条件，形成人口“引力”。在“压力”和“引力”的作用下，大批贫苦人民纷纷奔赴边疆海岛。“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这句谚语形象地表述了移民的法则，人口的流向和流量总是取决于地区之间压力和引力的差度。两三百年前，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区发生了“爆炸”，大批无产业的流民被强大的冲击波甩向四面八方，从中心四散辐射到边疆和海外，随着这个人口“爆炸”和“扩散”而来的是边疆和海岛的开发和繁荣。18世纪以来的这一人口“爆炸”过程应予充分研究，它的规模、时间、后果，当时移民的方式、路线、组织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边疆研究中的这些重要问题目前尚模糊不清以至完全空白。

当移民来到新的环境中，和当地土著民族一起向大自然进军，当他们通过劳动向环境索取富源时，即是在改变环境，对原有的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大自然有自我修复的机制，轻度的破坏，经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地恢复生态平衡。故边疆的某些荒僻地区，虽有人类活动，但人口很少，以采集、渔猎为生，亿万年来生态环境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大规模的游牧和农垦活动，特别是应用机器等近代化手段后，生产力发展，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越大，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越严重，其破坏程度超出了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人们就必须投入力量，给以补偿，使环境达到新的生态平衡。边疆开发活动必须遵循这一索取和补偿的法则，否则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国边疆许多地方经过长期开发，荆莽剪除，洪荒已辟，富源大开，表面看来，环境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适于人们居住。但是环境在被改造的同时，生态条件即在发生变化，由于违背了索取与补偿的法则，发生了森林破坏、牧场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的现象。环境在许多方面又日益变得“严酷”，变得难以栖息和活动。边疆开发的历史说明，人通过劳动对环境索取可供消费的财富，但环境的给予是有限度的，并且也不能是单方面的，贪婪无度的索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对自然的索取，应继之以对自然的补偿，才能使富源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所以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整治必须同时进行，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脱离的。

环境和人是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相互作用的种种规律有待于加深认识和详细阐明。我想,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当前边疆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清史研究通讯》1988 年第 3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历史学家的过去和现在

历史科学是基础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生活现象的总和，这些现象是历史的、能动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它既是有意识、有激情、并追求着自己目的人的活动，然而，人的历史活动又被已经形成了的环境和条件所制约，只有顺应历史的趋势，他们的活动才能取得接近于预期的结果。在历史的过程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必然的和偶然的、规律的和随机的，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构成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历史科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因为客观世界，无限丰富，并不断发展。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追溯各自的起源和由来，各有其专门的历史，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科技史；每个时代各个地区、国家、民族又各有具体的历史规律和特殊的内容，因而有各种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民族史。历史科学包含各种专门史和通史，涵盖面宽广，内容丰富多样，无所不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在中国，历史学又是时间悠久，积累丰厚的传统学科。我国有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完整的文字历史记载；有浩瀚的体裁多样的历史典籍；有包括各民族文字的文献碑版、丰富的档案史料、珍贵的文物遗存；有像左丘明、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郑樵、章学诚、梁启超、王国维那样杰出的历史学家，直至近代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等人。过去几千年的史学成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部分，它记录了中华民族生活、战斗和前进的里程，总结了先辈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反映了祖国伟大光辉的文明成果。

历史科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给人们以

智慧、力量和信心。为了认识社会,认识前途,认识人类自我,必须借助过去,观察它在一个较长时段中存在和发展的形式,进行历史的反思。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关联的,把过去当做不值一瞥的瘠野荒漠,而过分局限于眼前事件,往往会被一连串眼花缭乱的短暂变化弄得头晕目眩,而无法把握住社会运动的本质和未来。历史科学的作用,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在过去至现在的长期发展中,观察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这样才能够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因此,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过去,它只为过去提供较为客观、较为正确的图像,但它的意义并非只局限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过去的继续延伸,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现实的一切,或成就,或挫折,或胜利,或困难,无不萌生于过去,无不和过去结有不解之缘。对过去的事情进行研究和解释,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人们所以重视历史科学,也因为他们带着现实中的迷惘和困惑,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寻求比较正确的答案。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可能正确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人生活在现实之中,每个人在观察和研究过去的时候,总不免带着现在的思想感情和认识方法,人们经常会用现在生活中的要求和兴趣去研究过去的历史。过去历史中和现在密切相关的史实和史料,总会首先凸现在历史学家的眼前,引起历史学家的优先关注,这一点并不妨碍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性。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在选择研究课题和进行分析思考的时候,大多会选择那些与当前现实较有关系的问题,并站在当代达到的科学水平上去开展研究。历史学家越是关心现在,理解现在,就越能够深入地反思历史。现在的生活为他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展形态,以便去理解历史上尚未成熟的发展形态。如果人们对现在的事件漠不关心、失去兴趣,又怎能深入理解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呢?现在生活中的感受有助于历史学家去体验各样的历史生活,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对人体的解剖有助于理解类人猿的骨骼体态。

当前,中国历史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迅速奔驰,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历史学家有责任,在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

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在建设今天新生活的时候,反思过去,回顾国家和民族已经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这对人们是大有裨益的。改革和开放,需要人们更加了解我国的国情和传统,更多知道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也需要更加抓紧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教育。历史科学在现实中是大有作为的。它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培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陶冶人们的性格、情操,增加基本知识,帮助人们认识国情,了解自己的过去,廓清迷雾,以把握现在、面向未来。历史科学之树是常青的,它将为我们开辟新生活作出重大的贡献。

(《历史研究》1989 年第 5 期)

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这些年,河洛文化的探讨和研究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这里,我想就河洛文化研究中的四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　河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河洛地区是指黄河中游洛水流域(包括伊、洛、瀍、涧诸河)这样一个地区。河洛文化就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的文化。区域性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是炎黄文化的一个部分,而河洛文化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河洛文化起于远古,但截止的时间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到鸦片战争以前;有人认为区域性的文化只存在于秦朝大一统以前,统一以后就消失了,不必再提河洛文化。我认为说秦统一以后文化的区域性特点逐渐减弱是对的,但不能说完全消失。秦统一以后,我们中国还存在不存在区域文明、区域文化?这个问题是我们当前区域文化研究中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国是个大国,国土非常辽阔,民族成分也很复杂,因此,政治、经济、文化在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是长期存在的,这里面包括文化水平的高低,文化风格的不同等。这种文化差异在秦统一以后会削弱,会减少,但是并没有根本消失。因此秦统一以后,还是存在着区域性的文化的。如果研究区域文化只能研究秦统一以前,那么闽台文化怎么讲呢?显然就没法研究。因为闽台在秦统一以前还是很荒芜的地区,除了一些考古发现以外,谈不上很多的文化。我们去年开了一个闽台文化讨论会,讨论的就是秦统一

以后，主要是明清及近代的闽台文化。当然，区域性文化是属于全国文化的一部分。各个区域性文化之间是有共性的，正是这些共性使许多区域性文化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联系成中华民族的文明。但是区域文化也有自己的个性，有它的地域色彩，它在语言、艺术、风格、风俗等方面都带有不同的特点，正是这些个性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有多样性。

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中间居于什么地位呢？简而言之，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长期以来处于领先地位。说它是源泉，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河洛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七八千年来一直延续不断，前后相接，形成一个连绵不绝的文化发展系列。正是这样的一个长期发展的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影响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说它是个领先地区，因为河洛地区是中原地区，四通八达，从远古以来一直是我们先辈活动的一个中心，这里的文化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偃师二里头遗址最近一个重大发现是宫殿遗址。这个宫殿遗址很可能是五千年以前政权中心的所在地。五千年以前是什么时代呢？正好是炎帝黄帝活动的时代。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也都在这里。夏都斟　、阳城，就在登封一带。商都亳、隞也在河洛地区。至于周代，周公营造洛邑，见于古籍记载，后来平王东迁，这里就成为东周的首都。夏、商、周三代河洛都是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确实是人文荟萃，腾蛟起凤。我们说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地域性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因为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样一个地域性文化，对周围既有吸引作用，又有辐射作用。它既有强大的吸收、包容、凝聚的力量，把周围的文化吸纳过来；又有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渗透出去，影响周围的地区的力量。就像有些学者所形容的那样，河洛文化，一面是很强大的推动力，把自己的文化推出去；一面是很强大的吸引力，把周围地区的文化吸过来，形成一个“旋涡”。这个“旋涡”，不仅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周围文化的发展，所以说，河洛地区的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确实起着巨大的带动作用。

二 河图洛书的研究

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河图洛书，千古之谜。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公案。

中国古代有所谓河洛之学，这是指《周易》研究中的一个流派。据我所知，《周易》研究有两个流派，一是象数派，象数派是以万物的形象以及抽象的数字来解释《周易》，表述它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象数派研究《周易》在汉代最盛行，恐怕汉代的学者研究易经，基本上都是象数派。一是义理派，义理派是从哲学理论上、哲学思想上来解释《周易》，其代表人物就是王弼。王弼研究《周易》，一扫汉代象数派烦琐附会之弊。北宋初年，从象数派中间分化出了一个新的派别，就是图书派。从陈抟、邵雍、种放、刘牧到周敦颐、朱熹就是所谓图书派，并出现了“龙马负图”、“神龟背书”这样一些说法。这个问题六七百年来一直有着争论。北宋欧阳修第一个提出疑问：河图洛书究竟存不存在？以后历代的学者都提出疑问，到清朝初年，顾亭林、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这些学者，更对图书派进行了非常尖锐的、非常激烈的抨击。但是，这场公案看来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牵涉面广，又很复杂，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才能取得共识。比如，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气象图、方位图，有的说是一种数学公式、数学方程，有的说是祭奠的典礼，有的则把河图洛书跟安徽含山出土的玉帛相联系，并找到考古学上的根据。也有的说，太极图象征着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许多说法都力图从科学的角度、从实际观测的角度进行论证，进行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感觉到论证还不够，还需要有更充分的论据，更圆满的说法。讨论中，我认为应该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对于河图洛书，对于象数派、图书派不能简单否定。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这些书不是伪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